

新罗末期儒学的状况与崔致远的意义

党银平*、闵庚三**

< 目次 >

- 一、序
- 二、新罗末期儒学的衰落现状
- 三、崔致远的儒学造诣与现实矛盾
- 四、崔致远在新罗儒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 五、结论

一、序

新罗末期朝纲紊乱，国学废弛，佛教盛行，儒学逐渐走向衰微，崔致远是新罗末期儒学领域唯一最杰出的代表，他有深厚的儒学造诣及清晰的理论表述，他提出的人格规范、仁政理想及孝悌观念等儒家思想，在新罗近九百年儒学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本文拟通过有关文献的梳理，通过对新罗后期儒学现状的整体审视，彰显崔致远在新罗和韩国儒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深远意义。

www.kci.go.kr

* 中国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教授.

** 白石文化大学 中国语学部 教授.

二、新罗末期儒学的衰落现状

从历史上看，新罗输入儒学的时间较晚，朝鲜时期学者李种徽《薛聪崔致远列传》说：“当三韩三国之际，而新罗最僻远，人不知儒学。”¹⁾其国俗“不知跪拜，无长幼男女之别”(《后汉书·东夷列传》)，“好祭山神，……每以其日(重元日)拜日月神”(《旧唐书·新罗传》)。大约至三世纪末，新罗才开始接受儒家学说，但统一半岛之前，新罗主要依靠弓箭之术与花郎道来选拔人才，儒学只是郎徒精神的教义补充，这造成了新罗儒学不振的缺憾，朝鲜时期学者郑弘溟在《青鹤洞碑》中称：“国徒尚干戈战争，论诗作赋之士寥寥不闻，人不知道德文章，走马控弦之辈滔滔皆是。”²⁾崔致远对此曾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谢赐诏书两函表》中说明：“臣以当国……但属焚书余弊，犹随避地之徒；师古成规，久味移风之术。……《国语》、《孝经》，殊难化俗；床头《周易》，罕见知名。”³⁾又在《奏请宿卫学生还蕃状》中描述：“当蕃地号秦韩，道钦邹鲁，然而殷父师之始教，暂见躬亲；孔司寇之欲居，惟闻口惠。郟子则徒衿远祖，徐生则可愧硕仙。是以车书欲庆于混同，笔舌或惭于差异，何者？文体虽侔其虫迹，土声难辨其鸟言。”⁴⁾这是对新罗早期文教状况的真实描述。

新罗儒学的发展主要发生在李唐时期。贞观初年，唐太宗增设国学，扩大学舍和生徒规模，形成儒学复兴的彬彬盛况。新罗为了在与高句丽、百济的搏弈中获得综合优势，积极寻求与唐朝发展亲睦关系，其中，学习儒家文化是两国交往的重要内容之一。据《旧唐书·新罗传》及《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贞观十四年(640)，新罗善德王便派遣子弟进入唐国子监接受正规的儒学教育；贞观二十二年(648)，真德王又派遣文汪及金春秋入唐“诣国学观释典及讲论”；垂拱二年(686)，神文王遣使入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

1) 李种徽，《修山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47册，韩国景仁文化社2000年版)，第530页。

2) 崔致远，《崔文昌侯全集》，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版，第446页。

3) 上揭书，第51页。

4) 上揭书，第61页。

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天宝二年(743)，唐玄宗又将《礼记》和《孝经》赐予新罗，这都有效地推进了新罗儒学的活跃。

新罗又是一个善于灵活借鉴儒家文化的国家，真德王五年(651)仿唐制设置学官“大舍”(《三国史记·职官上》)，神文王二年(682)又仿唐设立国学，讲授儒家“五经”和“三史”；景德王六年(747)改国学为太学监，“置国学诸业博士助教”讲授儒学(《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九》)；再经过弘儒侯薛聪以本国方言注解儒经⁵⁾，新罗成功实现了儒学的本土化。特别重要的是，元圣王四年(788)仿唐推行科举制，设立以精通儒学典籍的三个等次铨选官吏的“读书三品科”⁶⁾，最终确立了儒学在新罗意识形态和教育思想中的正统地位，新罗由此出现“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⁷⁾及“崇尚信义，笃好儒术，礼让成俗，柔谨为风”⁸⁾的局面，成为东亚著名的“君子之国”和儒学之乡。

但这种向慕儒学的格局到新罗末期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儒学教育日渐显现衰落趋势。在景文王与宪康王时期，新罗国富民安，社会稳定，儒学在朝野尚有一定的影响。这两位国王都雅好博览典籍，钦重儒士，也偶而驾临国学视察督教，如《三国史记》卷十一记载，景文王三年春二月“王幸国学，令博士已下讲论经义，赐物有差”，“五年春二月，幸国学，命博士已下讲论”⁹⁾，但这样的记录已不多见，新罗举国对佛教更为虔诚和膜拜。七世纪中叶至八世纪前后，新罗佛教得势活跃，高僧辈出，寺刹林立，教派纷呈，最终形成了“五教九山”的繁盛格局，对新罗的社会风尚与文教思想影响甚大。新罗末代国王扩建寺庙、参与法会的记载史不绝书，如《三国史记》卷十一记载，景文王十一年“命有司改造皇龙寺塔”；宪康王二年春二月，“皇龙寺斋僧，设百高座讲经，王亲幸听之”，十二年夏六月“又于皇龙寺设百高座讲经”；定康王二年春正月，“设百座于皇龙寺，亲幸听讲”；真圣王元年“设百座皇龙寺，

5) 李祿(正祖)，《弘斋全书》卷二三 <弘儒侯薛聪>(《韩国文集丛刊》第262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 2001年版)：“方言解经，吏礼开途。倡起斯文，吾道乃东。”，第370页。

6)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十 <新罗本纪第十>，明文堂 1988年版，第277页。

7) 李瀾，《星湖全集》卷七 <溯江行序>(《韩国文集丛刊》第198册，景仁文化社 1997年版)，第167页。

8) 李浚庆，《东泉遗稿》卷五 <录遗许太史朝鲜风俗>(《韩国文集丛刊》第28册，景仁文化社 1988年版)，第347页。

9)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十一 <新罗本纪第十一>，大提阁 1988年版，第111页。

亲幸听法”，四年正月又“幸皇龙寺看灯”¹⁰⁾，可见对佛教的重视似乎远远超过了儒学，朝鲜时期学者李种徽《薛聪崔致远传》即认为正是因为过分崇奉佛教，所以“终新罗之世，而儒教遂不振”¹¹⁾。

特别自真圣女主以后，嬖倖肆志，贿赂公行，盗贼蜂起，朝纲废弛（《东史纲目》卷五上），新罗社会陷入长期的混乱与动荡，儒学的氛围日趋淡薄，现实功能严重弱化，朝鲜时期学者孙国述《孤云先生文集编辑序》即谓当时“国俗重佛教，而不知有儒道”。这种风尚从新罗末期一直蔓延到高丽时代，朝鲜时期儒士成海应这样评述：

自新罗至高丽，崇尚佛法，王子为僧，公主妃嫔听法，丽末儒学之士如圃隐、牧隐磊落相望，然未能悉闢之，如道说无学之说，或行于缙绅间。及至我朝，儒学大起，僧徒不期斥而自斥，佛宇并摧残毁坏，物盛则衰，固其势也。¹²⁾

这基本说明了新罗后期儒学凋弊、佛教兴盛的实况，而由唐返国的崔致远则是这一时期最值得称道的代表儒者，他对佛教的弊端曾有理性的辨识，在《真监和尚碑铭并序》中曾这样评述佛教的虚无性：“至若佛语心法，玄之又玄，名不可名，说无可说，虽云得月，指或坐忘，终类系风，影难行捕。”¹³⁾他以精湛的儒学素养、执着的淑世精神，在新罗末期的儒学天空中留下了令人瞩目的霞彩，朝鲜时期的《武城书院致祭文》赞誉说：“粤惟文昌，挺生罗季。历扬中朝，蔚为国瑞。文章学术，辉映千祀。……我东儒教，实自公始。”¹⁴⁾充分肯定了崔致远在新罗末期儒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10) 上揭书，第112、113、114页。

11) 李种徽，《修山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47册，景仁文化社2000年版），第531页。

12) 成海应，《研经斋全集》〈草榭谈献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75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版），第125页。

13) 《崔文昌侯全集》，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版，第124页。

14) 上揭书，第437页。

三、崔致远的儒学造诣与现实矛盾

在新罗儒学史上，崔致远堪称最有学识、最有修养的儒家学者。他十二岁游学入唐，自称“勤于儒道”（《桂苑笔耕集》卷十九《与客将书》），将儒教经典作为研修的事业，一生以儒门学者自居，谦称自己是“小儒”（《桂苑笔耕集》卷十八《贺高司马除官状》）、“凡儒”（卷十八《谢新茶状》）、“末儒”（卷十八《谢示延和阁记碑状》）、“腐儒”（《不染和尚碑铭并序》）、“尼父生徒”（《桂苑笔耕集》卷十九《贺除吏部侍郎别纸》）、“玄菟微儒”（卷十九《谢元郎中书》）、“儒门末学”（《上太师侍中状》）。通过博览儒家经籍，他积累了深厚的儒学知识，这种儒学素养较为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诗文中随处可见对儒家经典的广博而娴熟的运用。崔致远援引的儒家典籍涵盖了《易经》、《尚书》、《春秋》、《国语》、《论语》、《孟子》、《荀子》、《管子》、《礼记》、《周礼》、《诗经》、《楚辞》及《孔子家语》等主流文献，最常见的引用方式有三种：

1、直接引用儒家经典的成语或原句。直引《易经》者如《桂苑笔耕集》卷一《贺改年号表》“风始行于地上”出自《观》，《贺回驾日不许进歌乐表》“日月运行，雷雨作解”分别引自《系辞上》及《解》，卷二《谢赐宣慰兼加侍中实封表》“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出自《讼》，卷十四《宿松县令李敏之充招讨都知兵马使》“君子豹变”出自《革》，卷十九《五月一日别纸》“视履考祥”出自《履》，《新罗贺正表》“立国承家”出自《师》，《王妃金氏为亡弟追福施谷愿文》“学以聚之，问而辨之”出自《乾》，《真监和尚碑铭并序》“西南得朋”出自《坤》，《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憧憧往来”出自《咸》；直引《尚书》者如《桂苑笔耕集》卷一《贺杀戮黄巢徒伴表》“养奸而惟日不足”出自《泰誓中》，卷十九《与寿州张常侍书》“乃武乃文”出自《大禹谟》，《与假牧书》“室家相庆”出自《仲虺之诰》，《与礼部裴尚书瓚状》“龚行天罚”出自《泰誓下》，《大嵩福寺碑铭并序》“龟筮协从”、《谢

賜詔書兩函表》“誕敷文德”皆出自《大禹謨》，《奏請宿衛學生還蕃狀》“惟口起羞”出自《說命中》；直引《周禮》者如《桂苑筆耕集》卷五《奏任男劭華州失守請行軍令狀》“國有常刑”出自《地官·大司徒》；直引《禮記》者如《桂苑筆耕序》“人百之，己千之”出自《中庸》，卷一《賀改年號表》“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出自《王制》，卷二《謝賜宣慰兼加侍中實封表》“一辭而退”出自《表記》，《請巡幸第二表》“聞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必辟于其義，達于其患，然後能為之”出自《禮運》，《讓官請致仕表》“筋力為禮”出自《曲禮》，卷十二《光州王緒》“志不可滿”出自《曲禮上》，《新羅王與唐江西高大夫湘狀》“以儒為戲”出自《儒行》，《大嵩福寺碑銘并序》“得非尼父所謂無憂者其惟文王，父作之，子述之者耶”出自《中庸》，《無染和尚碑銘并序》“志不可奪”出自《儒行》，《法藏和尚傳》“攻木後其節目”出自《學記》；直引《國語》者如《桂苑筆耕集》卷三《謝除鍾傳充江西觀察使狀》“垂囊而入”出自《齊語》，卷六《請降詔旨指喻兩浙狀》“以吳與越，終當有越無吳”出自《越語上》；直引《孝經》者如《桂苑筆耕集》卷二《讓官請致仕表》“祇能因地之利”；直引《孟子》者如《桂苑筆耕序》“粗勝毀瓦畫墁”出自《滕文公下》；直引《管子》者如《桂苑筆耕集》卷一《賀處斬草賊阡能表》“有罪必誅”出自《七法》；直引《荀子》者如《桂苑筆耕集》卷二《請巡幸江淮表》“舜伐有苗”出自《議兵》；直引《孔子家語》者如《桂苑筆耕集》卷十三《李昭望充奉國巡官》“其先祖不足稱，其族姓不足道，然而大以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所致乎”出自《致思》；直引《楚辭》者如《桂苑筆耕集》卷六《請降詔旨指喻兩浙狀》“圓凿方枘”出自《九辯》，《法藏和尚傳》“尺有所短”引自《卜居》等等。

崔致遠文章中直接引用儒家經典次數和頻率最高的當屬《論語》和《詩經》。《論語》是記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語錄集，乃後世公認的儒家經典；《詩經》原名“詩”或“詩三百”，本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漢代被尊奉為儒家經籍，崔致遠對這兩部儒家文獻尤為熟悉，引用隨處可見，感覺得心應手。直引《論語》者如《桂苑筆耕序》“飽食終日，仕優則學”分別引自《陽貨》和《子張》，卷一《賀通和南蠻表》“用和為貴”引自《學而》，卷二《謝加太尉表》“見危致命”引自《子張》，卷三

《谢诏示徐州事宜状》“唯期宽则得众，粗可和而不同”分别引自《尧曰》和《子路》，《谢除锺传充江西观察使状》“戒之在斗”引自《季氏》，《奏请侄男劬转官状》“片言以折狱，未尝枉道而事人”分别引自《颜渊》和《微子》，卷六《谢加侍中兼实封状》“无使怨乎不以，能令可者与之”分别引自《微子》和《子张》，卷八《盐铁李都相公二首》第二“滔滔者天下皆是”引自《微子》，卷十《幽州李可举太保五首》第五“敢言筒在帝心”引自《尧曰》，卷十一《答江西王尚书书》“既知约我以礼，方信起予者商”分别引自《子罕》和《八佾》，《与礼部裴尚书瓌状》“此实修文德以来之，又乃不念旧恶之旨”分别引自《季氏》和《公冶长》，《谢恩表》“小人怀惠”引自《里仁》，《谢不许北国居上表》“尧舜其犹病诸”引自《雍也》，《法藏和尚传》“诲人不倦”引自《述而》；直引《诗经》者如卷一《贺杀黠黄巢徒伴表》“果划于左之右之”引自《小雅·裳裳者华》，《贺处斩草贼阡能表》“无思不服”引自《大雅·文王有声》，卷二《谢就加侍中表》“有命自天”引自《大雅·大明》，《谢赐宣慰兼加侍中实封表》“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引自《小雅·角弓》，卷三《谢秦彦等正授刺史状》“维虺维蛇”引自《小雅·斯干》，卷六《谢加侍中兼实封状》“不能踊跃用兵”反用《邶风·击鼓》句意，卷七《滑州都统王令公三首》第二“但属王事靡盬”引自《唐风·鸛羽》，卷八《徐州时溥司空三首》第一“匪足为报，永以为好”引自《卫风·木瓜》，《湖南闵頊尚书》“遍览左旋右抽”引自《郑风·清人》，卷十《幽州李可举太保五首》其一“唯望服之无斲”引自《周南·葛覃》，卷十一《答江西王尚书书》“展如兄如弟之分”引自《邶风·谷风》，《浙西周宝司空书》“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引自《卫风·木瓜》，卷十二《淮口镇李质》“日就月将”引自《周颂·敬之》，卷十三《李昭望充奉国巡官》“唯在聿修厥德”引自《大雅·文王》，卷十四《归顺军补衙前兵马使》“奋心于击鼓其镗”引自《邶风·击鼓》，《安再荣管临淮都》“岂唯衙左旋右抽”引自《郑风·清人》，卷十六《祭五方文》“物情则以享以祀”引自《周颂·潜》，卷二〇《上太尉别纸五首》其四“若及春日载阳，必无终风且暴”分别引自《豳风·七月》和《邶风·终风》。另《上襄阳李相公让馆给启》“如履薄冰”引自《小雅·小旻》，《大嵩福寺碑铭并序》“经始勿亟”引自《大雅·灵台》，《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挹彼注兹”引

自《大雅·泂酌》，《法藏和尚传》“声闻于天”引自《小雅·鹤鸣》，“我心匪鉴”引自《邶风·柏舟》，《翻经证义大德圆测和尚讳日文》“高山仰止”引自《小雅·车牵》等。

有时，崔致远还常在一句之中同时组接两种以上的儒家经典原句，如《桂苑笔耕集》卷四《奏李楷己下参军县尉等状》“学优则仕，既知禄在其中；见善若惊，不愧艺成而下”，“学优则仕”出自《论语·子张》，“禄在其中”出自《论语·卫灵公》，“艺成而下”出自《礼记·乐记》；卷九《前左省卫增常侍》“方愿惠然肯来，岂将率尔而对”上句出《诗经·邶风·终风》，下句出《论语·先进》；卷十一《浙西护军焦将军书》“永使必诚必信，谁云莫往莫来”上句出《礼记·檀弓上》，下句出《诗经·邶风·终风》；卷十二《楚州张义府》“将灭白圭之玷，遂以金作赎刑”上句出《诗经·大雅·抑》，下句出《尚书·舜典》，《和州秦彦》：“尔羊来思，我爱其礼”上句出《诗经·小雅·无羊》，下句出《论语·八佾》，《楚州营田判官綦毋莘》“欲令小人怀惠，伫看君子劳心”上句出《论语·里仁》，下句出《国语·鲁语下》；卷十三《许敬妻刘氏封彭城郡君》“岂独家之肥也，实谓邦之媛兮”上句出《礼记·礼运》，下句出《诗经·邶风·君子偕老》；卷十九《与金部郎中别纸二首》其一“既明且哲，则《诗》美贤人；视履考祥，则《易》称君子”上句出《诗经·大雅·烝民》，下句出《易经·履》；另《与礼部裴尚书瓚状》“既非莫往莫来，则亦何先何后”上句出《诗·邶风·终风》，下句出《礼记·曾子问》；《王妃金氏为先考及亡兄追福施谷愿文》“则其功也不疾而速，其愿也无为而成”上句出《周易·系辞下》，下句出《礼记·中庸》；《起居表》“是故夏谚称吾何以助，商书美后来其苏”上句出《孟子·梁惠王下》，下句出《尚书·汤誓》；《无染和尚碑铭并序》“其丽不亿，寔繁有徒”上句出《诗经·大雅·文王》，下句出《尚书·仲虺之诰》；《让位表》“臣闻欲而不贪，驾说于孔门弟子；德莫若让，腾规于晋国行人”上句出《论语·尧曰》，下句出《国语·周语》，同表“山下出泉，蒙能养正；丘中有李，众亦思贤”之“山下出泉”、“蒙能养正”引自《易·蒙》，“丘中有李”则引自《诗经·王风·丘中有李》；《谢嗣位表》“冀令一国兴让，惟在二人同心。引而进之，勿效疏受”之“一国兴让”出《礼记·大学》，“二人同心”出《易·系辞上》，“引而进之”出《礼记·

檀弓上》；《华严社会愿文》“同声相应，固当适我愿兮”上句出《易经·乾》，下句引《诗经·郑风·野有蔓草》。这类直接引用的例子在崔致远各体文章中中层见叠出，限于篇幅，本文不遑备举。

2、点化活用儒家典籍的语意。这样的例子也十分繁多，如《桂苑笔耕集》卷一《贺处斩草贼阡能表》“如纶之言”化用《礼记·淄衣》“王言如纶，其出如綍”，卷二《谢加太尉表》“德乏润身”化用《礼记·大学》“富润屋，德润身”，《谢示南蛮通和事宜表》“竞銜铄金之口”化用《国语·周语下》“众志成城，众口铄金”，《谢赐宣慰兼加侍中实封表》“临谷戒心”化用《诗经·小雅·小宛》“惴惴小心，如临于谷”，卷三《谢诏状》“启行十乘”化用《诗经·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卷十二《光州王绪》“自招相鼠之讥”化用《诗经·邶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卷十六《求化修大云寺疏》“富者不仁之说，自古所讥”化用《孟子·滕文公上》“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上襄阳李相公让馆给启》“孔圣绝粮，乃兴讥于滥矣；孟轲传食，尝致问于泰乎”，前者化用《论语·卫灵公》：“（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后者化用《孟子·滕文公下》：“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3、借用儒家典籍中的故事或寓言。借用儒家圣贤故事者如《桂苑笔耕集》卷四《奏请从事官状》“且如择邻卜居，断织励学”，即借用了儒学史上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列女传》卷一《母仪·邹孟轲母传》）；从儒经中借用寓言故事者如《无染和尚碑铭并序》“鱼非缘木可求，兔非守株可待”，“缘木求鱼”的故事典出《孟子·梁惠王上》，“守株待兔”的故事典出韩非子《五蠹》。

上述这些征引方式真实地体现了崔致远对儒家群籍的博洽与熟谙。

其二、崔致远对儒学思想有全面的理解和透彻的感悟，并根据自己的认识具体阐释了纯正而核心的儒家思想理念：

1. 崇尚中庸谦恭的君子风范。“中庸”是儒家标举的重要道德规范之一，崔致远对此深有领悟，他在《桂苑笔耕集》卷一《贺改年号表》中引《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¹⁵⁾

15) 上揭书，第289页。

在卷十《蕭邁相公二首》第二里谓：“伏以物忌太盛，器满必倾，自古有言，至今为诫。苟或不能知止，但欲贪荣，则有折鼎足之虞，炊剑头之险。”¹⁶⁾又在卷十八《长启》中称：“某伏以短绠不可以汲深，顽锋不可以割滞，是故不能者止。周任有言：自宜量力而行，岂可从心所欲。”¹⁷⁾并引《六韬》理性解释其原因与后果：“人才大小犹如斗也，不可盛石，满则弃矣。”因而他赞誉儒家先贤中庸守道的品德，希望人们能不断自我反省，秉承中庸的操守规范。

2. 赞美忧道不忧贫的高尚人格。春秋时儒门圣人孔子特别欣赏颜回安贫乐道、不改其乐的精神，后演化成了儒家所标举的忧道不忧贫的君子境界。作为一名新罗文人，崔致远常以此自励或励人，他在《桂苑笔耕集》卷十七《谢生料状》中自谓：“安贫而已贍晨炊，感德而惟知宿饱。遂使范家釜甑免恨长闲，颜巷箪瓢倍加其乐。”又在卷十九《谢宋絢侍御书》中宣称：“守道安贫，赢得爱闲之乐。”同卷《与金部郎中别纸》说：“既乐持盈之道，固安养素之机。”提醒自己并激励他人要时刻坚守贫而乐道的乐观信念。

3. 弘扬忠孝并重的家国意识。崔致远的忠君观念是很强烈的，他在《桂苑笔耕集》卷十六《寒食祭阵亡将士文》明言：“生也有涯，古今所叹，名之不朽，忠义为先。”¹⁸⁾要求臣子恪守“寸心报国”的最高本分；在卷十九《谢高秘书示长歌书》里他批评青莲居士(李白)、白石山人“但以风月琴樽为胜槩，不以君臣礼乐为宏规”，主张“弄才子之笔端，写忠臣之襟抱”。同时，崔致远极力维护儒家的“孝悌”思想，他在《桂苑笔耕集》卷十四《朱祝大夫起复》中说：“扬名显亲，竭力从命，孝之终也。”坦言自己出仕的本意是“本求食禄非求利，只为荣亲不为身”(《桂苑笔耕集》卷二〇《陈情上太尉诗》)，以实现“久想宗族称孝”(卷十八《谢探请料钱状》)的人生目标。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崔致远主张“夫忠于国者，无以家为”(《桂苑笔耕集》卷十一《告报诸道微促纲运书》)，即要求先国后家，“忠孝克全”(《桂苑笔耕集》卷二〇《上太尉别纸五首》)。在《桂苑笔耕集》卷七《壁州郑凝绩尚书》里他认为“于国于家，曰忠曰孝。……人臣之忠于国……人子之孝于家也”是人生“事标双美，誉冠一时”的

16) 上揭书，第334页。

17) 上揭书，第386页。

18) 上揭书，第373页。

最好选择，所以他在《桂苑笔耕集》卷四《奏请从事官状》中说：“臣子之所以立身者，以孝以忠，慎终如始，若遂荣亲之望，必勤事主之诚。”这样的忠孝观念在崔致远诗文中观点鲜明，且随处宣扬。

4. 提倡施行仁政和以民为本。崔致远的思想中贯穿着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他曾说“政以仁为本，礼以孝为先”（《大嵩福寺碑铭并序》），因而他非常推崇中国古代具有仁政色彩的圣贤名儒，如尧、舜、禹、汤、周文王、姜尚、孔子、萧何、陈平、黄霸、寇恂、疏广、廉范、袁宏等等，盼望帝王“齐家理国，恭己敬亲”（《桂苑笔耕集》卷一《贺封公主表》）、“不得已而用兵，无所私而煦物”（卷一《贺收复京阙表》），劝说大臣要“擢玄赏于烟霞，济苍生于涂炭”（《桂苑笔耕集》卷十九《与金部郎中别纸》）。

但崔致远的儒家理想却与他身处的混乱动荡的社会现实始终存在着巨大的矛盾。留唐时期他遭遇了历经十年之久的黄巢之乱，儒家理想自然难以实现；东归新罗后又经历了新罗由盛转衰的末世，他自称“奉使言归”的最高理想是“怀材待用……惟愿经邦佐圣”（《孤云先生文集》卷一《与礼部裴尚书瓌状》），宪康王也曾拜他为翰林学士，然此时新罗佛教流行，满怀抱负的崔致远其实已难有作为。真圣女主执政之后，秽乱后宫，重用宵小，堵塞贤路，新罗朝纲败坏，社会凋弊，继而陷入了动荡残破的后三国时代。崔致远怀着矫俗救弊之志，向女主进献《时务策》十余条，韩国学者推测其内容包括实施科举制、强化王权、尊重下级贵族意见及抑制地方豪族势力¹⁹⁾。女主虽然采纳了这些建议，并拜其为阿飡，但崔致远的建议遭到了新罗保守贵族的猜忌和阻挠，被外贬为太山郡太守。

崔致远在《桂苑笔耕集》卷十九《与假收书》中曾说明自己的性格为“执性近愚，处世斯直”，他也曾客观地批评唐末孝道沦丧、吏风不正的弊端，《桂苑笔耕集》卷七《宣歙裴虔余尚书二首》其二说：“近者时风仅讹，孝道多缺，事亲则薄，奉己为先，只将奔竞荣身，不以违离介意。”²⁰⁾卷八盐铁李都相公二首》其二说：“窃以世途多变，时事难言，泛泛如水中自安，滔滔者天下皆是。……获利者唯谋润屋，握兵

19) 李基白，〈新罗统一期及高丽初期的儒教政治理念〉，《韩国哲学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20) 《崔文昌侯全集》，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版，第320页。

者谁解清宫”²¹⁾同卷《幽州李可举大王》第四又谓：“近者列土诸侯，盈庭多士，唯以宦途锐志，少于儒术留心。”²²⁾如此梗直狷介的性格显然在新罗也会遭受非议，动辄得咎。为了远祸全身，崔致远遂“逍遥自放山林之下，江海之滨，营台榭，植松竹，枕藉书史，啸咏风月”(《三国史记》卷四六本传)，走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归隐道路。

四、崔致远在新罗儒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从新罗儒学史的整体高度来看，崔致远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儒学思想家，这不但因为他精熟儒家经典，弘扬了儒家的观念和理想，还在于他博通儒释道三家哲学的联系与区别，由此在韩国思想史上享有崇高的声望，由此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文化影响。

首先，崔致远的儒学思想是新罗时期儒学家中表述最清晰的。在崔致远之前，新罗也曾产生强首、薛聪等知名的儒学家，但这两个人都没有留下较完整的儒学著述，朝鲜时期学者李种徽《薛聪崔致远传》说强首曾“治《孝经》、《曲礼》”，又谓：“薛聪好读九经，以方言解其义，训导后生，新罗之儒，自聪始焉。……盖薛聪为东方儒者之始，而学士志之不倦，高丽显宗赠弘儒侯。”但也遗憾地承认“今南中往往有聪所制碑，而文字剥落不可读，其文章亦不知如何也。”²³⁾强首的文章今所见仅《册安胜封高句丽文》、《文武王大赦文》(《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六》)，薛聪的文章今仅存《花王戒》(《东文选》卷五二)，后人很难全面清楚地厘清他们的理论概貌和思想精华。崔致远则存世了大量涉及儒学的原始文献，为中韩两国学者梳理和阐述新罗乃至韩国思想史提供了第一手宝贵的原始资料。因而，《孤云先生文集重刊序》认为：“三千里内礼义之俗，先生实倡发焉。”韩国哲学会所编《韩国哲学史》将强首、

21) 上揭书，第326页。

22) 上揭书，第325页。

23) 《修山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47册，韩国景仁文化社，2000年版)，第530—531页。

薛聪、崔致远并列为新罗“代表的学者”，称崔致远是“统一新罗后期代表的儒家”，并肯定“崔致远比任何人都更具儒学家的素质与能力”²⁴⁾。崔致远的某些思想已经与后来朝鲜盛行的理学思潮(新儒学)颇有暗合之处，故而也被后代理学家奉为“东方理学之祖”。

其次，崔致远在新罗思想史上的综合素养是最全面的。他不但精通儒学，还对佛道二教造诣非凡。其留唐时所撰的《应天节斋词》、《上元黄篆斋词》、《中元斋词》、《下元斋词》、《禳火斋词》等，至今仍是研究唐代道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而他创作的佛教文献如《新罗伽伽山海印寺结界场记》、《海印寺妙吉祥塔记》、《大华严宗佛国寺毗卢遮那文殊普贤像赞并序》、《王妃金氏为考绣释迦如来像幡赞并序》、《终南山至相寺俨尊者真赞》、《翻经正义大德圆测和尚诃日文》、《海东华严初祖忌晨愿文》、《法藏和尚传》等，皆援儒释佛，见识深刻。著名的“四山碑铭”(《大嵩福寺碑铭并序》、《真鉴禅师碑铭并序》、《无染和尚碑铭并序》、《智证大师碑铭并序》)更是受到了朝鲜时期文人的厚爱，柳梦寅的《游头流山录》、沈光世的《怀崔孤云》、赵纬韩的《游头流山录》、南孝温的《智异山日课》及金驹孙的《头流纪行录》等都抒发了瞻慕之情，如今已是韩国国宝级文物，中国清代陆心源的《唐文拾遗》曾作补录，缪荃孙的艺风堂与顾湘舟的柳风堂也珍藏了部分拓片或拓本。当然，这些佛教著述也曾引发个别朝鲜时期学者诋斥崔致远弃儒奉佛的声音，如理学家李退溪就说：“如崔孤云徒尚文章而蹈佛又甚，每见文集中佛疏等作，未尝不深恶而痛绝之也。与享文庙，岂非辱先圣之甚乎？”(《国译退溪集》)，但卢相稷《孤云先生文集重刊序》辩解道：“人或以先生文句往往有梵语为疵，然俗之所尚，圣人或不免焉。猎较是也，先生岂真佞佛者哉！先生之学，以四术六经仁为本，孝为先，为宗旨，……先生为佛作铭，而斥佛之意闾然而章焉。”²⁵⁾坚持认定崔致远的思想仍然以儒家学说为主导，这很符合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最后，崔致远真实记录了新罗与唐朝儒学交流的情况。崔致远首次在韩国思想史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所谓“西学”的概念，他在《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中说：

24) 李基白，《韩国哲学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301页。

25) 《崔文昌侯全集》，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版，第3页。

“臣窃以东人西学，惟礼与乐，至使攻文以余力，变语以正音，文则俾之修表章，陈海外之臣节；语则俾之达情礼，奉天上之使车。职曰翰林，终身从事，是以每遣陪臣执贄，即令胄子观光，而能视鲸浪为夷途，乘鷁舟为安宅。锐于向化，喜若登仙。”²⁶⁾在《奏请宿卫学生还蕃状》又称：“(新罗)皆因译导，始得通流，以此敷奏天朝，祇迎星使，须凭西学之辨，方达东夷之情。故自国初，每陈蕃贡，即遣横经之侣，聊申慕化之诚。”²⁷⁾在《真监和尚碑铭并序》中亦谓：“夫道不远人，人无异国，是以东人之子，为释为儒，必也西浮大洋，重译从学，命寄剡木，心悬宝洲，虚往实归，先难后获，亦犹采玉者不惮昆丘之峻，探珠者不辞骊壑之深，遂得慧炬则光融五乘，嘉肴则味饫六籍，竟使千门入善，能令一国兴仁。”²⁸⁾这里所说的“西学”内涵指“西浮大洋，重译从学”，内容主要指学习儒家礼乐等，而且这个概念一直沿用到了高丽时期。同时他在《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中描绘了新罗入唐“西学”的盛况：“况遇开元阐化，大设衢樽，挹彼注兹，自近及远。每降汉使，精择鲁儒，两锡天章，一变海俗。故得乡无毁校之议，家有断机之亲。……是时登笈之子，分在两京，憧憧往来，多多益办，至今国子监内独有新罗马道，在四门馆北廊中。”²⁹⁾此类文字多涉及新罗学生的来华程序、习业场所、课业内容及应举登第等情况³⁰⁾，无疑为后人考察新罗与唐朝的儒学关系提供了原始的参考史料。

正因如此，韩国历代学者都高度肯定崔致远在新罗末期的儒学大家地位，赞誉其对韩国儒学演进的重要影响，高丽学者李奎报认为：“崔致远孤云有破天荒之大功，故东方学者皆以为宗。”³¹⁾朝鲜时期学者郑弘溟称许崔致远：“才超秦汉，学尧典舜典之文章；礼变齐梁；振周南召南之雅颂。……上自公卿宰相，下至士庶儿童，莫不诵先生之姓名，想先生之风彩。若非道德过人者，安能景慕如是乎？…惟先生通塞遏之词源，闢荒昧之学海，……东方之气习一变，国以扶持；北极之星辰为宗，人皆瞻仰。是以配公于圣人庙，谥公以文昌侯，流声千万余年，比肩七十高弟，慕先圣

26) 上揭书，第58页。

27) 上揭书，第61页。

28) 上揭书，第123页。

29) 上揭书，第57页。

30) 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60页。

31) 李奎报，《白云小说》(《韩国诗话选》)，太学社，1981年影印本，第2页。

德，至今祀之，使后世知其谁功也。”³²⁾这足以彰显出崔致远在新罗及韩国儒学发展史中的至高地位和独特魅力。

五、结论

新罗有崇尚儒学、重视儒士的传统，儒学曾对新罗的国家制度、思想教育、民风民俗等方面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建设作用，但新罗末期，统治阶层耽于享乐，沉溺佛教，儒学逐渐走向衰微，崔致远则是这一时期唯一杰出的儒学大家。他以深厚的儒学造诣及清晰的理论表述，在新罗儒学史乃至韩中两国的古代思想史上都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被赞许为“儒仙”、“东国儒宗”、“四海第一人物”、“学问巨擘”及“东方理学之宗”。本文拟通过有关文献的梳理，通过对新罗后期儒学现状的整体审视，彰显崔致远在中国和韩国学术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深远意义。

< 参考文献 >

- 李种徽，《修山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47册），景仁文化社，2000年版。
- 崔致远，《崔文昌侯全集》，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版。
- 李祢（正祖），《弘斋全书》（《韩国文集丛刊》第262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版。
- 李澐，《星湖全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98册），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
- 李浚庆，《东皋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第28册），景仁文化社，1988年版。
- 金富弼，《三国史记》，大提阁，1988年版。
- 成海应，《研经斋全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74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版。
- 李基白，《韩国哲学史》，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 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32) 崔致远，《崔文昌侯全集》，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版，第445—449页。

李奎報, 《白云小说》(《韩国诗话选》), 太学社1981年(影印本)。

< 국문제요 >

신라는 유학을 숭상하고 유학자를 중시하는 전통을 지니고 있었다. 유학은 일찍이 신라의 국가제도, 사상교육, 민속풍습 등에서 중요하고도 적극적인 건설의 역할을 하였다. 그러나 신라정권 말기 통치계급이 향락에 탐닉하고 불교문화가 풍미함에 따라 유학의 기풍은 점차 쇠락하였다. 최치원은 바로 이 시기에 걸출했던 유학의 대가였다.

최치원은 중국에서의 유학과 현지 문인들과의 활발한 교류로 당시 선진학문을 접하여 건문을 넓히고 내공을 쌓을 수 있는 기회를 가질 수 있었다. 이를 바탕으로 깊은 유학의 조예와 명석한 이론 수립과 설명은 신라유학사와 한국과 중국 양국의 고대 사상사에 이르기까지 매우 높은 학술적 영예를 얻게 되었다. 훗날 그는 한국과 중국에서 “유선(儒仙)”, “한국유학의 종주”, “사해제일(四海第一)의 인물”, “학문의 거장(巨匠)” 및 “한국 이학(理學)의 종주”로 칭송 받게 되었다.

본 논문은 관련 문헌을 통하여 신라 후기 유학의 상황에 대한 전체적 고찰을 통하여, 아울러 최치원이 한국과 중국의 학술사에서 가지고 있는 중요한 지위와 깊은 의의를 밝히고자 하였다.

關鍵詞: 崔致远, 儒学, 佛教, 新罗, 桂苑笔耕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2. 12. 31.	2013. 2. 5.	2013. 2. 12.	2013. 2. 21.	2013. 2. 28.